

中国古代史讲义

下 册

校内用书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目 录

封建社会下篇

第一章 北宋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宋、辽、 西夏的关系	1—62
第一节 宋王朝的统一与中央集权	1
第二节 契丹族、党项族的发展与宋、辽、西夏的关系	10
第三节 宋代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	20
第四节 神宗、王安石的变法	40
第五节 宋王朝阶级矛盾的发展与方腊、宋江起义	56
第二章 宋军民的抗金斗争与宋金对峙、 元朝的统一	63—110
第一节 宋军民的抗金斗争	63
第二节 宋金对峙下的南北社会	77
第三节 元朝的统一	92
第三章 两宋文化	111—123
第一节 维护封建统治的理学与理学家	111
第二节 科学与文化艺术的发展	118
第四章 元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124—188
第一节 元初巩固统一的政治、军事措施	124
第二节 元代的经济和科学文化	134
第三节 元代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元末红巾军大起义	155
第五章 明王朝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与 资本主义萌芽	189—268

第一节	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89
第二节	明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199
第三节	明王朝与边疆各族的关系	204
第四节	明代的对外关系	216
第五节	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下广大农民的 反抗斗争	227
第六节	商品生产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231
第七节	明中叶以后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与社会 矛盾的激化	243
第八节	明末农民大起义	251
第九节	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	260
第六章 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与各族人民 联合的增强		269—316
第一节	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加强	269
第二节	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与各族人民 联合的增强	279
第三节	清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95
第四节	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305
第五节	清王朝的对外关系与闭关政策	310
第七章 明清文化		317—373
第一节	明中叶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王学与反王学 的思想斗争	317
第二节	清前期的思想斗争	336
第三节	文学、艺术、科学、的发展	368

第一章 北宋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 宋、辽、西夏的关系

第一节 宋王朝的统一与中央集权

一 宋王朝的统一

宋王朝是赵匡胤官僚军阀集团，在960年利用“五代”以来将士拥立的风气，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起来的。

宋王朝建国的时候，在中国境内汉族居住的地区，依然在封建割据势力统治之下。当时与统治黄河流域的北宋同时并存的有八个政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地区有：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后蜀、南汉，在河东（今山西）的有北汉。它们各据一方，争战不已。而各个割据政权内部，又“国擅于将，将擅于兵”，依然是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

汉族以外中国境内的其他各族，当时以契丹、党项等族为强，尤以契丹为最强。契丹族于916年建立契丹国（即辽国），统治中国东北和北部广大地区，奴役着女真、渤海、回纥等族。到后晋时代，由于石敬瑭的卖身投靠，契丹遂夺取了汉族居地的燕云十六州之地，自此进而奴役了燕云一带的汉族人民。在经济生活方面，由于契丹族与汉族、朝鲜等族的长期接触，大大加速了契丹族经济发展进程，很快地从氏族公社制完

成着向封建制的飞跃过渡，但仍保留以“掠夺为光荣”的落后习惯。“乘间入塞，俘其人民”的掠夺汉族人民的战争，经常威胁着汉族人民和汉族的国家，契丹贵族的军事力量又很强，这就形成了对新建的宋王朝的严重边患。

从唐后期的藩镇割据战争，一直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混战，造成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摧残，对社会生产的极大破坏。中原地区尤为严重，淮南“六七年中兵戈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圉幅数百里，人烟断绝”^①。洛阳则“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②。中国北方接近契丹族的地区，则因“岁苦寇钞，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断绝。”^③当时南方各国，战争虽比较少，但由于统治者的腐朽，剥削的严重，人民困苦不堪，这说明“五代十国”时期，在整个汉族住区，阶级矛盾一直是相当尖锐的。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统一与割据的矛盾，这就是宋王朝建国初期面临的几项社会矛盾。

从宋统治者看，在当时三种矛盾中，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统一与割据的矛盾，成为解决或相对解决其他矛盾的关键。

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也是趋向于要求统一，要求解决统一与割据的矛盾的。

赵匡胤统治集团，从统治者的最高利益出发，企图把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扩大到汉族全境，或更大的地区，以完成宋王朝的统一。在这一点上，统治者的意图和人民的要求是结合起来了，宋王朝因此才完成了统一事业。

赵匡胤集团，根据宋王朝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与各国力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三四杨行密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七十三、僖宗光启三年。

③ 《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一。

量的对比，决定了“先南后北”，“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①的统一策略，并从963年开始，逐步发动了统一的战争。

宋的统一贯彻了原定计划，但具体步骤略有出入。

963年建立于朗陵（今湖南常德）的周姓政权发生了内讧，乞援于宋王朝，赵匡胤沿用“假道于虞以伐虢”的老办法，借道于荆南，出兵湖南，结果先灭掉荆南，接着湖南的周氏政权也被吞并。

乾德元年（965年）又两路出兵灭后蜀，开宝四年（971年）由湖南出兵灭南汉，开宝七年（974年）吴越王钱俶归附，开宝九年（976年）灭南唐。割据泉州、漳州的陈洪进，在南唐被灭以后被迫自动归附。自此在长江流域和以南地区的封建割据势力，全部被北宋兼并，这已是赵光义（宋太宗）作北宋皇帝的时代。

对于割据河东的北汉，因为它在契丹的扶持之下，最初赵匡胤还未打算对它使用武力，他说：“河东正扼两番，若遽取河东，便与两番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②。后在开宝二年（969年）用兵无功，开宝九年（976年），赵光义才率兵亲征，灭北汉。至此，除去燕云十六州仍为契丹所占外，中国汉族住区又归统一。

为什么宋王朝能够完成统一呢？这主要是由于统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

首先，长期苦于战争迫害的汉族人民要求结束割据，有一个统一与安定的局面。人民的这种要求在后周和北宋进行统一战争时，表现得非常清楚，他们欢迎后周、尤其是北宋的军

① 魏泰：《东轩笔录》卷一。

② 同上。

队，反对割据的政权。北宋以兵临荆南时，有的官员把这种统一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比作“以石压卵”。统一成为人们的共同要求，可想而知。

其次，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求打破藩镇割据的局面，完成统一。当时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但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割据分裂的局面，却严重地妨害着商业交换，割据湖南的政权为经营茶叶贸易，不得不修贡职于后梁。荆南曾因为断绝了与后汉的关系，结果“商旅不至，境内贫乏”^①，这说明商业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已占着一定重要的地位，割据局面怎样影响着商业的往来。

再加上抵御契丹侵扰的必要，统一已成为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的共同要求。这也就决定了北宋对各国统一战争的正义性质，无怪乎受到各地人民的广泛欢迎了。

统一之由北宋完成，也是有其主观原因的，这除去由于北宋采取了“先弱后强”的策略以外，北宋继承了后周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各方面实力都较其他各国雄厚。从下表可以看出：

国名	据有州县数目	户口数目
北宋	代周后有州111、县638	户967353。
荆南	取荆南得州府3、县17	户142300。
湖南	平湖南得州15、监1、县66	户97388。
后蜀	平蜀得州府46、县198	户534029。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后汉纪》三。

(续前表)

国名	据有州县数目	户口数目
南汉	平广南得州60、县214	户170263。
南唐	平江南得州19、军3、县108	户655060。
闽	陈洪进献地州2、县14	户151978。
吴越	钱俶入朝得州13、军1县86	户500680。
北汉	平太原得州10、军1、县40	户35220。
材料见《宋史》：地理志序		

二 中央集权的加强

为防止割据局面的再现、巩固新建的宋政权，赵匡胤又采取和制定了削弱地方权力、集权中央的政策与制度。

统一与集权，对巩固北宋政权来说，是一事两个方面。没有统一，就不能有集权；统一了不集权，也没法巩固。早在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就认识到唐末五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的原因，在于“节镇太重，君弱臣强”。所以在赵宋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就注意了削弱地方势力，集权中央措施的施行。集权的原则，赵匡胤采纳了赵普的建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①，也就是将政权、财政、军权一齐收归中央。

（一）军权的集中

军权对于保持政权的作用，这对久历行阵的赵匡胤来说是

^①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非常清楚的。在集权中他首先注意了军权的集中。

第一，赵宋规定了一套军事制度，以加强军事力量，削弱地方势力。宋朝军队分为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四种。^①禁兵就是中央兵，它保卫皇室京都，镇戍地方。为加强禁兵兵力，特别从原有禁兵和各地方兵中，选拔“才力技艺过人者”充当。禁兵的训练较严、装备较精、粮赐极优厚，人数也最多。另外的三种兵则相反。厢兵是“诸州之镇兵”，乡兵是选自户籍守卫乡土的兵，蕃兵是边疆上收服的部落兵。其中乡兵、蕃兵不常有，厢兵则因缺乏训练，“类多给役而已”。所以宋代名义上有四种兵，实际上只有直接控制在中央的禁兵最强，这种制度对于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控制地方，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赵宋又用给与优厚物质待遇、经济特权的办法，夺取了领兵旧将领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由此交出了兵权，但获得了“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②的特权，甘心到地方去作空头的节度使。从此宋王朝把禁兵交给“易制者”的将领掌握，以便为皇帝所控制。

第三，行更戍法。名义上行更戍法是让士兵“习勤苦，均劳逸”，经常轮流戍守地方或边郡。实际上在于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③，防止镇将专兵和地方势力再起。

第四，立枢密院。宋朝原规定殿前、侍卫二司掌握全国军

①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

②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六兵四。

权，但又怕二司权柄过大，就又立枢密院，掌握兵籍虎符调兵大权，二司只剩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军队的权柄。调兵权与握兵权互相分离，又互相牵掣，皇帝就可以稳稳地在上面对军事全权了。

以上措施实行的结果，虽收到了削弱地方势力及旧将领军权，而集军权于中央的效果，但这还只是宋代兵制作用的一个方面，基于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宋王朝在军事上是尤其注意到阶级镇压与防范的作用的。

第五，实行养兵制度，经常招募“亡命”、“流民”当兵，组成并扩大保卫地主阶级利益的武装力量，赵匡胤特别把这叫作“百代之利”的好办法。他以为这样“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①保卫地主阶级利益，镇压农民反抗，真是再毒辣不过了。

（二）财权的集中

从唐代开元、天宝以后，藩镇屯兵自养，地方租赋，往往用送使、留州名义，截留地方，上供中央的却很少。到“五代”时，藩镇势力更强，往往私派部曲去主持场院，肆意征税，这就更加强了藩镇的割据势力。赵匡胤为收回财政权，965年下令“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②又往往因藩镇出缺，派文臣去主持或监临场院，用以削弱藩镇的经济力量。

另外，又设转运使，主持一路的财赋；设立通判，主持一州的财赋。这也是削弱外藩，使利归中央的办法。

①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

(三) 政权的集中

为削弱地方的行政权和人事权，从963年平定荆湖起，下令将荆湖藩镇所属“支郡”，直属京师。从977年开始，又下令所有节度使不领“支郡”，藩镇的辖区缩小了。同时又规定中央直接派文官去出任知州、知县，“权知军州事”，藩镇的人事权也缩小了。

赵匡胤还怕知州的权柄过大，除规定地方官三年一换外，又在平定荆湖之后，在各州设通判，以分知州的权柄。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无所不管，又有监督知州，“事得专达”朝廷之权，这就大大削弱了知州把持州政的可能，地方权力更集中于中央了。

赵匡胤对中央官僚的权柄，也大大加限制。为削弱宰相的权柄，规定军事行政由枢密院掌握，财政权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剩的权柄只有一般行政权而已。另外又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的副职，提高台谏官的地位，以监视各级官僚，特别是高级官僚，官僚的权柄更削弱，皇帝的权柄更大了。

赵宋还用“职”、“官”分离的办法，削弱各级官僚权柄。^①宋朝官僚名分，有“官”，有“职”，有“差遣”。

“官”、“职”都是虚名，“官”以定等级定俸禄，“职”以特别优待有文学才华的士大夫。只有“差遣”、才是真正有职、有权作实事的官僚。无论中央与地方，都由皇帝命令“差遣”任事，这使官僚任命权直接操之中央。

赵宋王朝对于官僚们的权力尽力加以限制，目的无非是统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官制总序。

一起地主阶级力量，以便更有效地对付农民阶级的反抗。所以宋王朝在限制地主官僚一切政治权力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尽量优待他们，团结整个地主阶级。宋朝官僚的待遇是极其优厚的，有俸禄、有赏赐、又规定有恩荫和免税役等的特权。优待官僚，必定加强对人民的剥削，所以后来有人说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①，其政权的阶级实质，就表现得非常清楚了。为团结整个地主阶级，又大行科举考试，为地主们开辟升官的便利途径。

宋朝统一与集权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是诸种社会矛盾发展斗争的结果。他的完成，影响了社会矛盾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宋朝的统一与集权，巩固了宋的统一政权，结束了唐中叶以来的长期的藩镇割据局面，并基本上防止了以后割据局面再现，此后我国历史的发展正说明了这点。当然对于宋代的统一与集权又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正如毛主席所说，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形成，“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②而统一局面的出现，就可能造成国内的一定的安定环境，便于人民从事于社会生产，这就使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社会经济文化也有所发展，这种阶级压迫的暂时缓和，对社会发展也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宋代的集权，随后也带来很多弊害。“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的结果，必然厚敛于人民，促进着刚刚缓和的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化，宋太宗时已有人民的武装反抗发生，仁宗时人民起义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似一火”了。宋王朝的集权又是以“分化”“防范”为法的，结果军权集中，带

①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8页。

来了兵力的分散，兵力的削弱。财权的集中，形成统治者的迅速腐化。政权的集中，带来官僚人数的增多，官僚机构的庞大臃肿，反使行政效力减低。这些流弊就更促进对人民剥削的加强，阶级矛盾的尖锐，和对辽夏斗争的失败。

但从当时来看，统一与集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第二节 契丹族、党项族的发展与 宋、辽、西夏的关系

北宋时期，在中国边疆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东北和北部的女真、契丹，西北部的党项、回鹘、高昌，西南的吐蕃、大理等。他们开发着祖国的边疆，发展着各族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共同创造着祖国的历史文化。

女真族居于我国东北的所谓白山黑水之间，到宋初还过着“佃渔射猎”，“夏则逐水草以居”的半渔猎半游牧生活。约到十一世纪初，女真族的完颜部定居按出虎水附近的时候，才开始了定居和农耕生活。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还不曾脱离原始氏族公社制阶段，但是在十一世纪契丹族兴起的时候，他们已被役属于契丹贵族统治之下，受着种种奴役与掠夺了。

回鹘、高昌都属于维吾尔族。九世纪时，回鹘发生内乱，被北面的黠戛斯人战败以后，西迁于河西走廊的回鹘人建立回鹘国，居地以甘州为中心，又称为甘州回鹘。他们一直与宋王朝保持着良好的政治、贸易等关系，每向宋以“方物来贡”，还曾助北宋反击西夏的掠夺。但到十一世纪时，由于西夏的强大，回鹘为西夏所败，族人大部再迁西州以西。回鹘国家被黠戛斯战败后，另一部分西迁的回鹘人，以西州（今吐鲁蕃一带）为中心建立高昌国，称西州回鹘。高昌同样与宋王朝长期

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贸易关系，屡次遣使“来贡方物”。十一世纪时维吾尔人曾控制了整个天山南路之地，并曾派使与宋联系，愿助宋进攻西夏。这些西迁的维吾尔族人，主要的经济生活，已由游牧转变为农耕或半耕半牧了，主要的私有财产，已不是牲畜而是土地了。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那是十至十三世纪的事情。

西南的吐蕃，在九世纪中叶，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其内部发生了分裂，诸贵族集团形成为割据势力，不断发生战争，这种战乱局面延长了几百年之久。与此同时，僧侣地主势力也发展起来。人民在割据混战和僧侣地主压迫下，生活是极端困苦的。但这时住在甘、青、川、滇地区的藏族人民，由于临近汉族地区，彼此的经济联系并未中断以茶和马为主的相互交易，有很大发展，愈益成为两族相互依赖的重要经济联系。另外，藏族的一些土邦、如唃廝罗等经常和宋王朝发生“朝贡”，“结援”等政治关系。

大理是937年继南诏之后以洱海周围为基础，在我国西南建立的国家。以白族为主体，统治着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农业、畜牧手工业较南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汉人维持着友好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与波斯、中印半岛长期维持着经济往来。国内佛教信仰发达。

蒙古族居住在漠北草原的东北，经营着游牧的畜牧生活，处在氏族、部落的较原始阶段。

由上可以看出，当时其它各族，虽然所居地区不同，所过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不同，但在创造着自己历史文化的同时，都与宋王朝和汉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友好的关系，这不仅加深了各族人民的传统友谊，同时对于丰富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促进各族经济文化的发

展，也都起有积极作用。

在少数各族中，有两个比较强大的势力，一个是居在东北的契丹族，从916年起，开始建立了契丹国（辽国），并于936年进占燕云十六州之地，奴役当地汉族及各族人民。另一个是居住银夏等州的党项族，到十一世纪时，也建立了大夏国。他们势力都比较强大，经济文化也比较进步，并与北宋紧相毗邻，因与北宋的关系最为复杂，下面着重讲一下宋与辽、夏的关系。

一 辽国的发展与宋辽关系

契丹(辽)建国以后，依然推行向邻国的战争掠夺政策，掳夺奴隶、财富，给各族住区的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破坏。不过在对待俘虏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口，或“依唐州县，置城居之”^①，继又允许诸王外戚大臣及部落首领以俘虏作私属，建“头下军州”，实行赋役剥削，“官位九品之下及并邑商贾之家征税，多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②，这里已包含封建剥削的因素。加以契丹太宗吴乞买侵占汉人住区燕云十六州之后，契丹已辖有“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③的广大辖区，民族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适应这种情况，辽太宗在官制上规定“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设北面官，南面官，两种官制并存。契丹人更多的跟汉族进步的经济文化相接触，从政治制度到社会生产都逐渐向封建制转化了。以后契丹境内的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乃至文化艺术都有了较

①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传》。

②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

③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大的进步，有的艺术品和建筑物还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都提供了证明。但是由于契丹族的社会发展，是在先进的渤海人与汉人等的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下飞跃发展而来，发展又很不平衡，契丹族落后的思想、习俗，还保存了不少。“五代十国”的长期年代中，“乘间入塞、俘其人民”的掠夺战争经常发生，就是基于这种思想习惯发生的。一直到宋王朝建国时，虽然由于封建经济的腐蚀，契丹贵族逐渐腐化，契丹贵族内部的争夺权位斗争日趋尖锐，但它对宋的威胁，依然存在。尤其燕云十六州的形胜地带，为契丹所据有，每成为契丹贵族军队掠夺宋北部汉人的基地。这说明，宋初宋王朝与契丹的民族矛盾仍是尖锐的。对宋来说为使十六州人民摆脱奴役和解除边防威胁，收复燕云是势所必行的。

不过宋王朝从建国起，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对内的削弱藩镇势力，防范镇压农民起义上，放松了收复燕云的斗争，正如后来宋太宗赵匡义所说：“国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①以后宋王朝统一了内部各势力，企图发动收复燕云的斗争了，这时辽世宗、穆宗以来的辽贵族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已渐平息，国势又有恢复，相反的宋王朝本身，军事权柄统一了，军事力量反而逐渐削弱，这就形成以后宋王朝在对辽夏斗争中，长期陷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

宋王朝在宋太祖时代，除在北边驻有名将大军以防范契丹贵族进扰外，又曾与契丹维持过和好局面。到宋太宗灭北汉后，始与辽断绝和好，开始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斗争。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在宋太宗赵匡义亲率大军灭北汉

^① 《宋史·宋太祖传》。

以后，想乘机收复燕云，部下将官多以兵疲饷匱，应稍事修整，不愿立时动兵北伐。而殿前都虞侯崔翰独主张乘势因时伐辽，认为：“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①结果宋太宗从太原进兵攻幽州，沿途州城辽守将纷纷投降，正要攻下幽州，辽援军赶到，与宋兵大战于高粱河（今北京城西），宋兵大败，辽兵追到涿州，宋太宗乘驴车狼狈逃走，兵仗粮饷遗失无数。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宋太宗接受雄州守将贺令图的建议，认为辽圣宗（983—1030）年幼即位，母后肖氏临朝，大臣用事，国人不满，乃收复燕云可乘之机，又乘机分兵三路伐辽。曹彬东路出兵雄州，田重进中路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县紫荆关），潘美、杨业西路出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原计划东路持重缓进，牵掣辽兵于幽州之南，使潘美一路乘虚大进。进军之初，宋三路都有胜利，但因东路军粮不继，曹彬又贪功冒进，结果大败于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西路、中路也不得不后撤。西路原已占领云、朔、寰、应四州，及西路奉命撤退，副将杨业计划有步骤地将四州吏民向南转移，沿途杨业以孤军与辽大军奋战掩护，但陈家谷（今山西朔县南）一役，因众寡不敌，杨军损失过重最后杨业重伤被俘，不食而死，部下亦均壮烈牺牲。

宋太宗时两次收复燕云，“恢复旧疆”的正当战争，都在没有周密计划、没有充分准备和军事指挥失宜的情况下失败了。这不但造成宋王朝物资上兵力上的极大损失，宋军制的腐败，军力的削弱，也开始暴露，这就更影响了以后对辽关系的被动和失利。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